

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·經部》評介

郭明芳*

一、前言

現今臺灣所藏善本書就只有幾個館：1949年前後從大陸運來的館藏，包括「國圖」、「傳圖」、「故宮」、「國防研究院」(已裁撤)與「臺師」等館，與臺灣本地的典藏機構，如「臺圖」、「臺大」、「東海」等館。當然還有為數極少的大學館也有線裝書收藏，如「政大」(羅家倫、原黨部孫逸仙圖書館舊藏)、「東吳」(故校長端木鑄秋舊藏)、「文化」(張其昀等舊藏)與「佛光」(王雲五舊藏)等館。早年幾個大館曾在中美相關經費挹注下完成各館古籍編目，出版有書目、聯合目錄。然各館陸續又有新增館藏，除「臺圖」曾於1992年有新編書目外，皆無再整理。而書志之編，至今則各自為政。臺北「國圖」是較早編成並出版《書志稿》的單位，但失之簡略¹。其次，若干大學近年來亦積極整理館藏，以「東海」整理並出版的「善本書目新編」，實具有初步「書志」規模，其成效也最為可觀。而其他各館，仍無動靜。

近5、6年來，古籍整理已為各館主事者重視，陸續整理，如「傳圖」、「故宮」等館。現「傳館」書志經部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·經部》(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編纂小組編，臺北市南港區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3年10月，下或簡稱「書志」)已然出版，其嚴謹、考證翔實，勢必引領臺灣書志撰寫風潮。出版至今，僅有一篇文章介紹²，筆者不遑淺漏，再起筆為文，試為評鶯。

二、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及其整理

「傅斯年圖書館」原為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」附屬圖書館，後為紀念故所長傅斯年先生，改稱「傅斯年圖書館」(下或簡稱「傳圖」、「傳館」)。「傳館」藏古籍來源可分兩部分敘述。其一是來自民國大陸時期(1912-1949)，這部分是館藏最主要來源的部份，包括購自藏書家鄧邦述藏書與戰後接收北平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藏書。鄧邦述藏書處名曰「群碧樓」，收有宋版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¹ 沈津曾言，臺北國圖《書志稿》每則文字不足500字，無法揭示每書價值，如所藏元刻《金剛經》為首部朱墨印刷圖書，於版刻史上有其重大意義與價值，而未見揭示。

² 張家榮撰〈精華初現--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·經部評介〉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191期，頁43-47，2014年11月。

《李群玉集》、《碧雲集》，因以為名；又有為人所熟知的「百靖齋」，是以明版書收藏著稱³。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乃日方成立，推動修纂續修《四庫全書》之工作單位。當時亦積極採購圖書，收到不少來自書賈收自藏家的圖書。其二乃是來台後在臺灣所得者，多著名學者捐贈的藏書，包括傅斯年、李宗侗、毛子水諸人。

現今「傳館」藏線裝書約十九萬冊，善本書則約四萬冊。這樣的數量，在台灣也可稱之「大館」。而這些善本的價值頗高，常為研究者欣羨寶貴資料。「傳館」藏善本在善本書志編寫前僅有沈津一篇略微勾稽若干種而已⁴，根本無助於研究者求知若渴的慾望。「傳館」館藏古籍整理在近年來完成善本題跋的整理，進而啟動書志撰寫計畫。《書志》於黃進興所長〈序言〉裡說到該館古籍整理始末，可為本節結尾：

民國五十七(1968)年本所編印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善本書目》，五十九(1970)年編印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普通本線裝書目》，對本所所藏善本、古籍線裝書進行大致的整理與界定。民國八十九(2000)年三月黃寬重副所長召開本所善本書目審定籌備會議，擬定傳圖善本古籍範圍，開啟重新審定傳圖古籍版本的契機。民國一百(2011)年在傳圖何漢威主任的推動下，開始編纂善本書志，翌年(2012)傳圖同仁在劉錚雲主任領導下，完成經部書志的撰稿。

三、《書志》的編纂體例與內容

《書志》收錄「傳圖」館藏經部善本書志 463 部，包含宋刊本 4 部，元刊本 6 部，活字本 3 部，稿本 41 部，鈔本 105 部。其中 40 種典籍及 6 種版本未見他館著錄。《書志》主要收錄「傳館」所藏善本經部 463 部。這裡所稱善本是指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刊本，以及民國以前各種稿本、抄本與珍貴稀見的刊本。館藏副本亦著錄，惟簡單說明之，以瞭解館藏副本情形。

每書首列索書號、書名卷冊數，再列作者、版本(刊刻時間)等訊息；次以小號字體列版式行款、扉頁、刻工等訊息於書影之下。次則內容概述，是否

³ 有關鄧邦述藏書事蹟與入藏傳館，有碩士論文一篇，詳吳欣潔〈鄧邦述藏書研究〉(新北市三峽區：國立台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0年6月，吳哲夫指導)。

⁴ 詳見沈津撰〈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〉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(臺北)》88年2期，頁77-106，1999年12月。

有序、跋，書內著者署名如何，主要著者生平簡歷；再則版本判定緣由，此多據各館複製影本、書影、圖錄分別判定。最後則該書鈐印與重要書目(如《四庫全書》系列、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)著錄情形。基本上一面一部書志，但內容重要者，至多兩面。

《書志》全彩印刷，每種典籍均附有卷端書影，以及**節選部分重要的刊記**、扉頁等，故亦兼具圖錄性質，不僅讓讀者能藉由觀賞圖像了解傅圖的藏品，更便於研究者比對其他各館藏的版本，有利於從事各方面的研究，吸引更多人來挖掘傅圖的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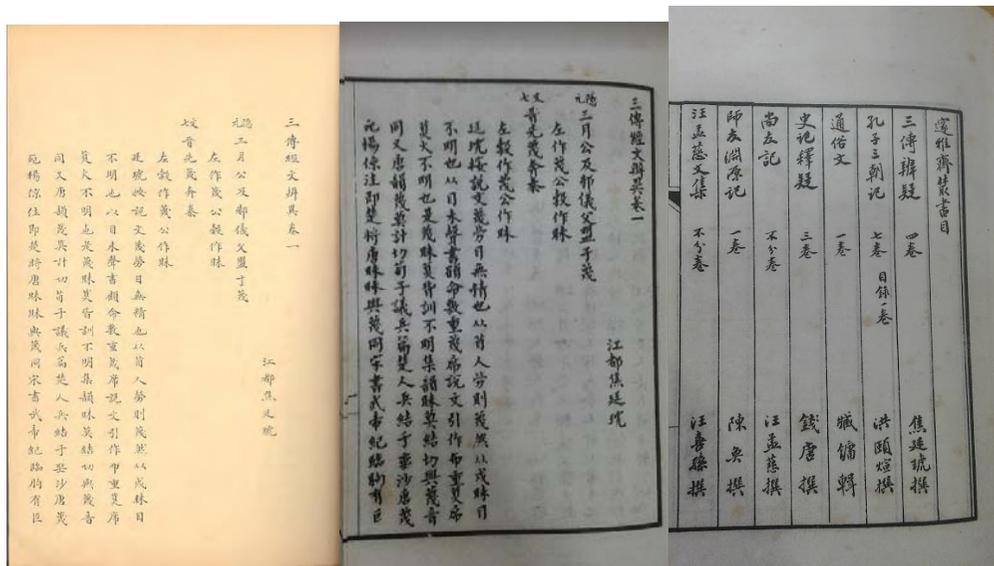
四、《書志》特色

(一)整理揭示館藏，提供他館參考

《書志》經部非僅對一書進行外觀描述，其最重要還是要揭示這部書在館藏、甚至在古籍中的價值。沈津曾為文學例臺北《國圖書志稿》對於每部書約僅 300 餘字描述，根本無暇顧及某書在文獻學價值，例如臺北「國圖」所藏的一部朱墨套印《金剛經》是第一部朱墨印刷物，在印刷史上價值非同等閒，但《書志稿》卻無相關文字揭示。《書志》對「傅館」藏經部書若干有價值者則有文字揭示，如館藏《古音駢字》(頁 355)、《奇字韻》(頁 357)、《俗書勘誤》(頁 365)、《字學》(頁 368)諸書，屬於文溯閣《四庫全書》一部份。按，《書志》著錄作「抄本」應作「寫本」。「文溯閣」本《四庫全書》今雖儲放在甘肅，但歷經從瀋陽、經北京，再到蘭州，輾轉遷徙中偶有遺失，亦屬正常。現通過館藏整理，得以告知世界，若干「文溯閣」書下落，倘日後欲影印「文溯閣」本，不應漏「傅館」所藏。

雖然《書志》對於揭示館藏價值已較《國圖書志稿》為佳，然筆者認為應該可以更好。例如說館藏兩部明代不同刊本《尚書日記》(見頁 30-31)，僅說明一是萬曆 10 年、一是萬曆 23 年刊本，兩者關係如何，孰優孰劣亦應有所交代。又館藏《韓詩內傳徵》(頁 98-99)有乾隆原刊本、嘉慶宋氏重刊本兩種，未見有他館藏。今日較流行者，乃徐乃昌刻入《積學齋叢書》者，亦應補入說明。

其次，《書志》出版，對於他館整理館藏或研究者也提供許多資料。如焦廷琥《三傳經文辨異》(頁 215)，著錄「手稿本」，並云「邃雅齋」有影印本，內容小異。筆者所知，「東海」館也藏一部佚名鈔本(前有佚名〈題要〉一則)，就可以核對三者異同，深入研究。



「東海」本、《遂雅齋叢書》本

(二)特別重視每書的版本判定

善本書、線裝書的整理應特別重視版本的審定。因為研究者對一書版本，除非必要，多不會特別考訂，直接將工具書(如書目、書志)資料運用於研究。如果版本審定上隨便，造成的研究錯誤亦大且深遠。因此，不管書目或善本書志對於版本審定是最重要、最基本的。雖然「傳圖」所藏古籍或有前人所撰敘錄(如鄧邦述撰群碧樓、寒瘦山房等目)、或早期編纂的書目，但因為早期不若今日資訊發達，無法比對各本，造成誤判在所難免。而一般書目或書志於版本判別，率爾行事，或僅據某書序文時間為訂，但如此，亦有相當危險性，即序文時間不一定是刊刻時間。因此《書志》在版本判定上力求嚴謹，並與現有各種他館所藏影本、圖錄，甚至資料庫加以比對，並且運用諸如避諱等項訊息，詳加考訂，以求其實。劉錚雲先生在《書志·前言》亦云，

基於力求客觀、重視證據的原則，本書志的版本審定，特別著重版本比對工作。在條件所及的範圍內，廣泛運用影印、縮微等古籍複製出版品，以及各藏書單位古籍資料庫的全文影像或節選書影、精品圖錄、善本書目或書志等諸多材料，來辨別版本異同，並區分初印、後印、修補、增修、重訂等細節差異。以期能向讀者描述更詳細的館藏本刷印情形，顯示其版本價值。

(三)附書名著者與印主索引便利檢索

《書志》附人名、書名索引外，尚附藏印主人索引，方便尋檢。這對於

一般已出版的書志而言，所下功夫更多，也更便利讀者。其實，筆者認為不僅藏印應編索引，刻工、書坊書舖也應該編制索引。如此做不僅利己，也利人，往後編纂史部以下書志或他館整理古籍時，可以利用到刻工、書舖來核對版本，增加版本可信度。

(四)提供版本學、藏書史研究資料

此類於《書志》中，筆者也發現幾種：

1.紙廠印記的著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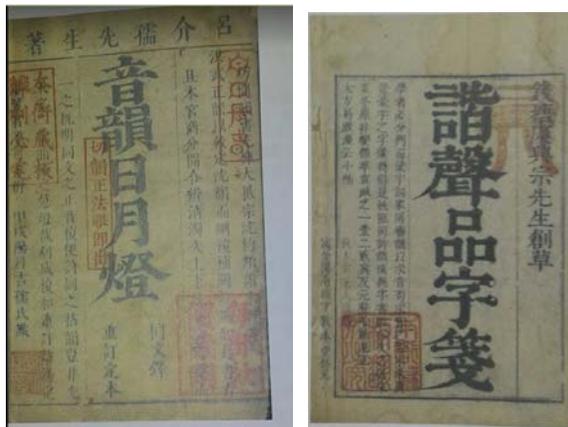
過去紙廠印記並不受到重視，但紙廠印記可以提供版本判別上一些意見，《書志》對於此類印記分別著錄，如《書經》(頁 37)，著錄了「錦慶南號」、「吳慶昌號本舖開設周慶鎮中市富安橋^堍上岸坐北朝南門面自運檢擇各省名茶趙行發販不悞」等印記，這對瞭解古代紙張發售有相當幫助。

2.刻書史研究資料

《尚書集注音疏》十二卷十六冊(頁 41)附江聲〈募刊尚書小引〉：「九年之中，資或不繼，...，凡用銀四百五十兩，後得成此刻。」這裡四百五十兩應該只是刻書之價，不包含印價、裝訂價，古代刻書所費不貲，非虛言也。

《音韻日月燈》(頁 436)附扉頁書影，有「每部紋價二兩」印，對研究明末書價是難得材料。又有「《切韻正法眼》即出」印，也是作為研究書業廣告的活教材。

又如對於版本學上「本衙」定位問題，雖有學者為文闡述，但仍有不足。「本衙」非官府刻書明矣，而此類書籍是否是私人刻書或書坊刻書，又為何署「本衙」，是否有其意義，均值得蒐集相關實例再加深究。而諸如《書志》所收《諧聲品字箋》亦是一實例。



書價資料書影

又有關書版買賣問題，如《書志》有《爾雅正義》(頁 290)，著錄「清乾隆 53 年刊、54 年重訂本」，並著錄有刊記「琉璃廠西門內北京金陵文炳齋劉德文鐫刻」，於版本項應將補入此項資料。又云此本與「面水層軒」同版。從兩本分別比對，文炳齋應早於面水層軒，是書版轉移之證。



「遠大」藏金陵文炳齋本書影



面水層軒藏版書影

3. 書籍史研究實物

古代書籍如何裝訂、書籍裝訂襯紙如何等。館藏「《書經集傳》存一卷一冊」條(頁 27)，稱「此本係由傅圖藏清康熙間(1662-1722)刊《坤輿圖說》之夾葉析出成冊，…」。

又元刊本《大學或問》(頁 237-238)，全書以元朝公牘紙印行，保存了元朝江浙行省一帶的諸物時價、民田土地、司吏履歷、地方雨量等第一手史料

4. 藏書史研究的議題

《書志》所錄頗多稿本或鈔本，這些稿抄本是否為真，有些頗值得深究。清末民初，書賈喜倩人抄書，或用舊紙、或偽刻鈐印，所偽作古籍幾可亂真。館藏稿、抄本中是否有這樣的可能性，尤其是乾隆(含)以前稿抄本，一、二百年來竟無藏家藏印，豈不奇怪？再說，「傅館」所藏有很多鈐印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印記，此乃戰後接收北京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藏書。該會當年為撰《續修四庫提要》所得之本。當年書賈為售該會書籍，難保不會作假稿抄本，加以變造牟利。筆者舉一例，以說明所疑。《書志》載《毛鄭異同考》(頁 81)，雖從避諱、比對「中國圖」所藏，訂為稿本。但與「中國圖」藏本比對字體有些微差異，加上程晉芳藏書於晚年多毀於水災，是否為原稿本，頗值討論。

又《春秋釋例》存十一卷(頁 157)，此書無邊框，著錄「清乾隆嘉慶間抄本」，又推斷此書抄自「文溯閣」本《四庫全書》。按，「文溯閣」原來儲放今瀋陽，所存為《四庫》內四閣之一，非皇親國戚無法進入。此本何人進入閣內抄錄？且此書僅有近人易漱平、李宗侗二印，如是嘉慶以來抄本，竟無流傳，豈不怪哉？此本當可進一步探究成書原因。

五、《書志》撰寫上的問題舉隅

(一) 版本判定商榷例舉隅

《尚書集注音疏》(頁 41)著錄「乾隆 58 年自刊後印本」，「自刊」應改作「近市居」刊本。古代著作刊行不易，蓋於金錢耗費太多，許多文人刊行著述，或與書坊合作。此「近市居」即書坊名，非著者自印之齋名。

明天啓間刊本《毛詩振雅》(頁 77)。其卷三版心有「雙桂堂藏版」，又有序自署稱「書於金陵之雙桂署中」，惟扉頁有「版築居藏版」。《書志經部》認為「張氏刊成後，書版歸傅氏印行」。筆者則認為是書乃張氏與版築居合作刊行之例。⁵

《六家詩名物疏》(頁 71-72)，館藏兩部，分別是明萬曆 33 年陳三吾刊本

⁵ 筆者認為古代出版不易，非世家大戶無法刊印著述。而為使自己或先人著述能出版、藏諸名山，因此有書坊與私人合作刊行圖書之例。

與後印本。然筆者撰有〈明代馮復京著述及其六家詩名物疏版本著錄考述〉⁶一文，從後印本「博物齋」扉頁文字避諱字考察(此扉頁惟僅臺北「國圖」有)，此本為天啓間修補刊本。

《吳文正公三禮考注》(頁 134)著錄「乾隆二年吳氏家刊本」，此書有扉頁「本家藏版」，據此作家刻本則有待商榷。卷一頁一署名「裔孫」數人，是否姓吳，猶未可知。又如是家刻本，堂號當自然光明正大寫出，不可能僅用「本家」代之。而書坊刊本亦有云「本家」者，魏隱儒曾記《雅頌正音》有招商牌記：「本家已刻梓行世」云云(見《書林掇英》頁 80)，此乃坊刻本之證，又此本倘為書坊與某家合作刊印，亦不能稱家刊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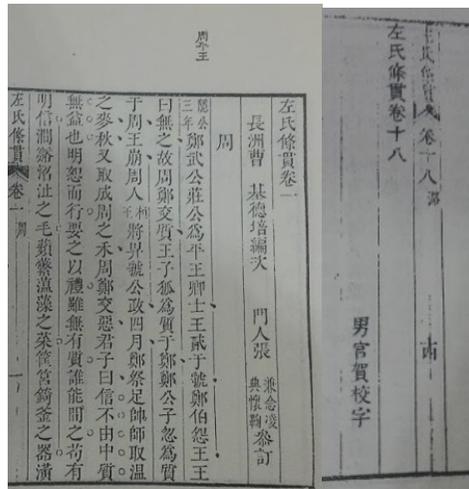
《左氏條貫》(頁 174-175)，館藏兩部，一部著錄「清雍正間印本」(00149)、一部「康熙間刊雍正間同德堂印本」(00150)。《書志》於第一部(00149)言，「與本《書志》00150、《續修四庫》影印湖北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一年致和堂刻本同版。湖北省圖本卷一未有『男官賀校字』一行，傳圖兩本皆無。…」按，此有筆誤，00150 為同德堂印本、非致和堂。又查「復旦」所藏清康熙間致和堂印本(「復旦」本有「致和堂」扉頁)卷一書影與「傳圖」00149 比對，卷一墨等皆有之，兩者同版無疑。00150 為同德堂本，因未能見到 00150 書影，無法比對二者是否為同版，或書版易手刷印，是否為前後版關係待查。而「鄂圖」本卷一葉一似乎較為清晰(尤其署名、天頭文字)，應是較早刷印。又從「鄂圖」本有男校字、「傳圖」本無之來看，或許「鄂圖」本為較早刷印。其是否家刻本、抑或坊私合作下刊印，因資料不足，無法斷定。但可以推測，「鄂圖」本是較早刷印、次則「傳圖」00149 與「復旦」的「致和堂」本(此本後將男校字字樣刪削)，最後書版則是售予同德堂再刷印。



「復旦」藏本《左氏條貫》書影

「傳圖」藏本書影

⁶ 《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》第 23 期，2013 年 9 月，頁 83-108。



「鄂圖」藏本書影

《春秋大事表》550 卷(頁 203)，著錄「乾隆十三至十八年自刊後印本」，扉頁有「乾隆十三年新鐫、萬卷樓藏版」。此書版本甚多，「北大」藏有同治十二(1873)年平遠丁氏翻刻本，版心亦有「萬卷樓」字。而扉頁署「萬卷樓」者有「北大」、「武大」皆藏一種與「傳館」藏同署「乾隆十三年」。按，武大藏本「三」脫落一筆成「二」。故此本應作乾隆十三年萬卷樓刊後印本，非自刊本。



北大(左)、武大(右)藏本書影

《春秋經傳類求》(頁 209)著錄「乾隆 24 年吳禧祖刊修補本」。「吳禧祖」者卷一署名校訂者，而是書扉頁有「舊名堂藏版」。校訂非刊行，且扉頁又「沈歸愚先生鑑定」，是書坊刊本、非私刊本。因此是書應作「乾隆 24 年舊名堂刊修補本」。又本《書志》常將自序作者當成是刊印者之例頗多，如《樂律表徵》(頁 275)著錄「乾隆 28 年沈孟堅刊本」，實際上扉頁有「耆學齋藏版」，應作「耆學齋刊本」。古代刊書非易事，非有大戶權貴，或則募資刊書，一般

人根本不可能刊行書籍。

《春秋究遺》(頁 210)著錄「乾隆嘉慶間刊本」，《書志》言比對「北大」藏耕餘堂刊本，同，應加注於其上。《書志》次頁《春秋困學錄》(頁 211)，「人大」藏扉頁有「尊五堂藏版」者，其版相同亦同。

(二)手民之誤舉隅

《書志》於書末附錄〈印主名錄〉，於「盧文弨」條下繫「抱經樓」印(見頁 545)。按，盧文弨藏書處為「抱經堂」，非「抱經樓」。而有「抱經樓」者，其印主為盧址。核之該館藏「《華夷譯語》存《百夷館》不分卷」書影(頁 298)，知此「抱經樓」印乃偽印，為古書流通處書賈陳立炎所偽刻以牟利之用。⁷

(三)版面編排舉隅

《書志》版面編排，雖是附書影彩色印刷，然每種書籍「版式行款」以小一號字體排於書影下，與正文分開。如此，版式行款似乎成附屬，且非特別注意，不易為人注意。

又《書志》中記某書有某人題記應全錄，蓋此類資料對研究者來說更是重要，不應不錄或刪節，《尚書集要》(頁 35)丁丙題識有刪節。雖說該館編有遑遑三冊所藏題跋彙編，但便利讀者尋檢，附於《書志》中仍有必要。

六、結語

「傳館」《書志》經部已出版，這是很好的開始。「傳館」在臺也算是所謂館藏豐富的「大館」，而能撰寫完成如此大工程，其關鍵在於主事者決心與參與者持之以恆的用心。從經部的完成、繼而史部、子部、集部、叢部，再而普通本線裝書，終有完成的一天。「傳館」如此，其他館，如故宮、臺圖、臺大、臺師等，更應急起直追，迎頭趕上。臺灣館藏線裝書不多，但如能全部加以整理、撰寫書志，透過文化實力的展現，不僅清理自家館藏，也能提供研究者更多研究訊息，相信更會贏得世人的另眼相看的。

書名	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--經部
編者	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編纂小組
出版地	臺北市南港區
出版社	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出版時間	2013 年 10 月
頁數	553 頁
I S B N	9789860377781
售價	1600(新台幣)



⁷ 關於藏書家有「抱經」與此印，詳拙撰〈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成書再考〉(待刊)。